

论加尔科夫斯基后现代主义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

戴卓萌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造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之百家争鸣的局面。德米特里·加尔科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既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特立独行的现象。在这部作品中, 既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思想方面的探究, 又有对伟大经典作家艺术手法的感知和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此同时, 加尔科夫斯基还给出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进行各种诠释的语境。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援引; 互文性; 感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语

德米特里·叶夫盖尼耶维奇·加尔科夫斯基(1960年—), 俄罗斯作家、哲学家、政论家。1986年莫斯科大学夜校毕业后靠印制销售违禁文学作品谋生。他的哲理性长篇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成稿于1987年, 发表于1991—1992年(1997年正式出版)。

《无尽头的死胡同》面世之初, 由于书的内容新颖, 形式奇特, 竟有20多家著名报刊如《新世界》、《莫斯科》、《文学报》、《独立报》等争先恐后登载。自由派维诺格拉多夫和传统派柯日诺夫对此书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 当编者和评论家们在通晓全文内容后, 随即认为这样做是“把妖魔放了出来”, 于是多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 责备作者标新立异、粗野蛮横、假装斯文和剽窃他人作品。对作者关于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评述, 自由派指责他“反犹”, 传统派则批评他“仇俄”。

1992—1993年间, 加尔科夫斯基陆续发表了《地下人》、《破损的罗盘指明道路》、《摒弃缺点》、《斯图奇卡的孩子们》等。这些小说同样引起很大的争议, 最终导致加尔科夫斯基拒绝同谴责其作品是毒草的俄罗斯新闻界合作。1996—1997年间, 加尔科夫斯基创办了杂志《破损的罗盘》(出版了三期), 主要刊登他本人的作品及关于这些作品的评论文章、读者来信等。杂志就其内容来说,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颇为相似。

1997年底, 俄罗斯《独立报》反布克奖评委会把当年的卡拉马佐夫小说奖授予加尔科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出人意料的是, 加尔科夫斯基拒绝接受该奖项并放弃了12001美元的奖金。他不无道理地认为, 来自攻击其作品一方的奖励是对一个文学家最大的侮辱(可引申为“不再需要你了”), 是一种假惺惺的伪善。同时, 加尔科夫斯基也希望以此证明今后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谋生, 而不需要向那些抢劫无数赞助者和捐款人的强盗摇尾乞怜。

1998年1月, 加尔科夫斯基创建了个人网页。2001—2003年间, 《文学报》、《独立报》、

《文学日》、《保守分子》发表了加尔科夫斯基的《神圣短篇故事集》。2003年发表文集《宣传》，2004年发表文集《磁铁》，2005—2006年在网络报发表《观点》一文，2007年在杂志上刊发《俄罗斯生活》一文。根据2009年12月21日团体“开放空间”(Openspace)所进行的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问卷调查中，加尔科夫斯基排名第十二。¹

2 《无尽头的死胡同》的艺术特点

根据加尔科夫斯基本人的说法，《无尽头的死胡同》是一部描写19—20世纪俄罗斯文化史以及虽软弱不幸、但仍然顽强生存的俄罗斯人之命运的哲理小说。作者思想自由，立论大胆，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冒犯权威和偶像，挑战定论并准备随时展开争论。然而，在那些看似狂妄的言论里面不乏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作者的某些议论又显得朦胧隐晦，具有某种属性上的相对性特点，有时甚至彼此矛盾。

小说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均一反常规、离奇怪诞。全书由949个注释组成。注释的正文是24岁的“地下哲学家”奥季诺科夫撰写的关于瓦西里·罗扎诺夫的题为《无尽头的死胡同》的报告。按常理，这部由注释构成的作品的书名应为《〈无尽头的死胡同〉的注释》。然而，作者认为正文并无独立的意义，而是把注释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由此颠倒了传统文本中正文和注释的关系。小说的结构同样别出心裁。全书是对正文的注释，部分段落是对注释的注释，甚至是对注释的注释的注释。就内容来说，这部作品涉及了社会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书中除了主人公奥季诺科夫和他的父亲外，还有一系列历史人物，包括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契诃夫、纳博科夫，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还谈到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作者旁征博引，摘录了上述历史人物的大量言论，或进行评议，或借题发挥。小说末尾附有作者模拟评论家写就的七篇书评，从不同角度剖析此书。

加尔科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小说同时包含了艺术和非艺术的因素，其中充满了文学、哲学、科学和其他方面的论述。小说主人公奥季诺科夫同时又身兼“作者”，为小说撰写注释。在这部长篇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加尔科夫斯基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大量引用和思考；其次，奥季诺科夫的形象在很多方面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不同人物“组合而成”。关于主人公奥季诺科夫的描写风格和文体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法极为相似，这个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诸多特点。如奥季诺科夫描写自己的幻想时采用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马卡尔·杰弗什金的书信语体。当然，这其中区别还是有的。伊万·卡拉马佐夫充其量只是一部诗剧的作者，作品互文性部分来源于《圣经》、启示录，部分来自18—19世纪的俄罗斯和西欧文学，奥季诺科夫则是充满各种文化和文学代码的大众文学作品的“普世作家”，他引用和分析的是更为广阔的文化和文学，关注的对象是俄罗斯苏维埃和世界文化，所涉及和援引的是从《伊利亚特》直至今天的作品，包括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本身。后现代文学研究者И.С.斯科罗巴诺娃对此指出，“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的文本中有着大量的引用，致使作品相当部分的容量完全被引用所涵盖，其中不乏对文学作品、历史的、宗教哲学的、文化哲学的、心理分析的论文之逐字逐句的引用。”（Скоробанова 1999：442）这里我们看到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使得作品互文性的疆界被扩大到了作者引语的运用中。

至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的大量互文性特点，根据加尔科夫斯基对文化哲学的感知可以按以下几类来进行解读：

第一类：19—20世纪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中分析和诠释了各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与同时代人关系的史实材料。

第二类：19世纪俄罗斯文学语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三类：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之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

第四类：研究相对于文学作品更能展示作家个性和世界观的政论文献和《作家日记》。然而，应该指出，加尔科夫斯基常常“挑衅”读者既有的认知模式，有时甚至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个性的感悟降低到了日常水平。有些注释的风格被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笑话”形式。这在读者看来无疑是亵渎了伟大的作家。

第五类：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后来文学如纳博科夫和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影响。尽管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无好感，但他的创作中仍有很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互文性引用。

3 小说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化哲学感知

在《无尽头的死胡同》中，加尔科夫斯基表达了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之与众不同的观点。И.С.斯科罗巴诺娃指出，“《无尽头的死胡同》强烈反对使俄罗斯文化史陷于过于贫瘠和扭曲的正统版本，说到底就是反对实证主义，反对任何压制鲜活真理的教条。对西欧化、激进左派之意识形态以及马列主义进行抨击，以此捍卫斯拉夫派、右翼保守派和宗教哲学思想。”（Скоробанова 1999：451）然而，加尔科夫斯基对斯拉夫派的描写没能够保持始终如一的立场：除了一些肯定性的因素外，作家还提出了一系列有争议性的因素。关于斯拉夫派他指出：“决定俄罗斯命运的不是这些人。”（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6）应该指出，加尔科夫斯基小说中的历史不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和概括，而是某些固定人物的实践活动结果的事实序列。这些事实成为加尔科夫斯基讽刺性解读的对象。小说中真实的历史人物中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描述俄罗斯历史时，加尔科夫斯基指出，“问题在于俄罗斯历史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俄罗斯思维会停滞在生产形形色色的塞子上？是为了自我毁灭，为了俄罗斯思想不从错乱中滋生和衍生出来。在俄罗斯人的大脑中，两个完全对立的塞子会相向撞击，一起毁灭。两个直径相同的‘怎么办’重合到一起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什么也不办’。这就是俄罗斯历史的不幸之所在。”（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9—10）正如我们所见，在回顾俄罗斯 20 世纪初的历史时，加尔科夫斯基做出了悲观的结论。与历史发展相应的还有负载全部矛盾和差别的文化的发展。由此可见，加尔科夫斯基描写的时代从根本上讲是充满矛盾和混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才华正是通过诸如此类事件的语境得到发展，他本人最终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及之后文学史上的泰斗。作家的领悟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体验可以从其 17 岁那年首次遭遇的生活考验说起。作家当时所在的工程学校内盛行贿赂。加尔科夫斯基以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的语气评价学生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多尔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优秀，但不会并拒绝行贿，成绩排名在中间，是一个三分生。”（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69）。接下来加尔科夫斯基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1838 年 10 月 30 日写给父亲的信（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5：т. 28-1，52）：“我为自己的考试成绩感到骄傲，我考了个优秀，那又怎么样？我被留了一级。我的天哪！我有什么激怒了你？为什么你的来信中不能对我宽容一些？……唉，我为此留了多少泪。听闻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很糟糕。那些考得远不如我的人（受到庇护）都通过了。有什么办法，看得出来，自己是无法打通道路的。”就在这第 522 条注释中，加尔科夫斯基接下来从摘自 10 月 31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长的信中长篇累牍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就是俄罗斯现实。一边是‘能力比较强的’，另一边是‘教唆犯’。从童年起就这样了。”（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69）在加尔科夫斯基看来，这一切对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成为该时代的一面镜子，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作家经常使用真人真事来作为书中情节和人物的原型。

还有一个注解是关于工程学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兄长索要一件外套。加尔科夫斯基引用了 1848 年 10 月 7 日的信。（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5：т. 28-1，128）加尔科夫斯基指出：“从书到外套，从《外套》到书。”无疑，这里指的是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俄罗斯文学理

论研究者们多次指出两位作家的继承性关系。加尔科夫斯基在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以弄清继承的根源时，仿佛在补充（也许是批驳）已经写好的文学作品。他广泛运用戏仿，然而在戏仿的背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隐藏的生活事件逻辑本身。在奥季诺科夫的面具下，读者看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加尔科夫斯基试图弄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小组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赞同傅里叶主义思想。问题仅仅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当时一位名人本身构成了一道屏风，人们可以用他来掩护这些地下小组的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说成是彼得拉舍夫小组的中心人物。他的知名度和高尚的人品不允许他去指认同志，并过分竭力证明自己无罪的事实，最终让他成为一位名义上隽拔的主席。”（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545）加尔科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明白当时的处境，这使他免遭了后来的厄运。然而，成为流放地总结的《死屋手记》真实地展示了这些事件给他的难忘经历。就这样，加尔科夫斯基从奥季诺科夫（这是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相近的人物）的视角出发描写所发生的事情。在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阶段的履历时，加尔科夫斯基添加了自己的主观评价因素。加尔科夫斯基在分析作家的书信时得出的结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的语境下无法不成为环境的牺牲品。

加尔科夫斯基认为别林斯基、索洛维约夫、列昂季耶夫、罗扎诺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一些，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影响过这位作家。加尔科夫斯基不认为别林斯基具有批评家的天才，因此他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这样水平的人争论毫无意义。在注释 268 中，加尔科夫斯基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斯特拉霍夫的“私人”信件：“恶臭的昆虫别林斯基（您至今都不欣赏）体弱多病和没有天赋，因此诅咒俄罗斯并有意识地给它带来那么多的伤害……这是俄罗斯生活中最恶臭、愚蠢和无耻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无法避免只能让人深深的遗憾”（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75）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结论。实际上，加尔科夫斯基援引了两处原文：省略号之前的论述引自 1871 年 4 月 23 日，而省略号之后的则引自 1871 年 5 月 18 日（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6：т. 29-1, 208—215）。这样，加尔科夫斯基用事实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多年的轻蔑。

加尔科夫斯基没有详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相互关系。他只是援引了一个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索洛维约夫所说的片断：“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一个好人。为了成为一个完美和纯洁的基督教徒，你应该去干三年流放的活儿。”（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245）这个片断与真实引语相比，更像是“伟人生活中的谑戏”。

在将列昂季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时，加尔科夫斯基揭示了两位作家之间的相似和不同：“总的来说，列昂季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相似。在历史学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显得更强，在宗教方面对于列昂季耶夫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致力于的就是他的理想。”（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82）加尔科夫斯基还提及列昂季耶夫所谓的“玫瑰色基督教”概念。这个概念的实质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解读上帝对人的爱是基督教基本原则的同时，却忘记了上帝之爱的另一方面——上帝的愤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立场被列昂季耶夫定义为“玫瑰色基督教”。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昂季耶夫，加尔科夫斯基运用了众多引文试图弄清基督教的实质。为此目的，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是否是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真正的实质是什么？）。加尔科夫斯基本人没有给出最终答案。他构架出一个问题情境，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扎诺夫、列昂季耶夫、索洛维约夫等连同其理念和思想均置放于其中。这里，每个人有其各自的世界观体系，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观点是相同的，但要再现历史事件的完整画面却是不可能的：诸多事实混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万花筒。加尔科夫斯基一方面试图公正地分析历史，另一方面所有的诠释又是来自奥季诺科夫极为主观的反馈。在注释 921 中，提供了一个或许可以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昂季耶夫的关于基督教的定义——“玫瑰色伪基督教”（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653）。但这只是一种或许的定义。

进入加尔科夫斯基视野的另一位是罗扎诺夫。在《无尽头的死胡同》中，有不少关于罗扎诺夫的注释，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扎诺夫》主题占有特殊的位置。加尔科夫斯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两人都对书刊审查制度持否定态度。根据加尔科夫斯基的观点，罗扎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确切给出了俄罗斯思维和俄罗斯民族性的两个人：“罗扎诺夫通俗易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通俗易懂。这就是下里巴人。俄罗斯人就是下里巴人，简单易懂。……罗扎诺夫应该属于大众型人物。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大众型人物一样。”（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16—117）这一思想在《无尽头的死胡同》中得到了发挥：“罗扎诺夫超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Галковский 1994：248）加尔科夫斯基把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定义为和谐时代，而罗扎诺夫则是“生活在衰落和个人已经绝对自由（和混沌）的时期”。（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16）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罗扎诺夫在某种意义上的相互对立，源于不同文化时代在不同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留下的不同印迹。根据加尔科夫斯基的观点，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相比，罗扎诺夫有着更为复杂、独特的世界观体系。小说中对该时间段的解读即是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加尔科夫斯基产生影响的少数作家之一。加尔科夫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置于 19 世纪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以便从作为一种文学和艺术的历史因素角度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加尔科夫斯基对这位经典作家的特殊关注不无象征性质：《无尽头的死胡同》的主人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最为相似。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关注，加尔科夫斯基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同貌人》、《地下室手记》、《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们》成为加尔科夫斯基关注的对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作品中，加尔科夫斯基都发现了界定俄罗斯思维民族特点和心灵辩证法的重要因素。

在注释 6 中，加尔科夫斯基提及了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貌人》，并在两部作品之间发现了互文性联系。该互文性既表现在两个人物之间的联系（波普里欣是戈利亚德金的前身），又表现在主人公各自的两重人属性方面。加尔科夫斯基多次指出果戈理创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并列联系。这一问题之前已有了很广泛研究，但加尔科夫斯基将它同俄罗斯思维中民族性特征联系在一起：“两重人主题”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因素在每个俄罗斯人个人命运中均会表现出来。

4 主人公奥季诺科夫形象析

《无尽头的死胡同》是 20 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现象，其中展示出作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文化哲学和艺术的个人理解和研究。文化哲学的研究是在对与作家生活和创作、历史和自传性质的文本解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与此同时，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作家的文学代码用于塑造小说主人公奥季诺科夫的艺术形象，从而形成一个后现代文学中的作者兼主人公的人物，并通过对援引信件的比照和文字背后的意义以“我-文本”的形式体现出来。奥季诺科夫的形象带有自传性质。加尔科夫斯基在其小说和有关访谈中多次强调这一点。在《无尽头的死胡同》的注释 3 中他写道：“在文本中，我将以‘奥季诺科夫’命名自我个人因素。”（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2）在一次访谈中，作家道出这是他母亲娘家的姓。他在一次发言中承认说：“自己的姓我不能写，因为担心会受到迫害。”（Аллен 1993：355）

奥季诺科夫的身份认同在很多方面是通过主人公不同情境中的“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的相互关系以及将其自传中的某些片段与伟大作家作品的某些描写结合得以实现的。加尔科夫斯基的目的是通过主人公的自我认识来认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

加尔科夫斯基在小说中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讽刺性，描绘了对奥季诺科夫来说非常典型的傻笑“嘿嘿”（注释 24、74、100、373、867 等中），这种笑在《罪与罚》中经常能读

到。在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中，“嘿嘿”既有讽刺意义，又有果戈理之“含泪的笑”的意味。最鲜明的例子之一是奥季诺科夫对父亲之死的感受：“是的，他曾经活着，你明白的，存在过，而突然，嘿嘿，就‘你们收拾东西吧’。”（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74）值得一提的是，奥季诺科夫只是姓氏（其意义为孤独），没有名字和父称。可能由此他才会如此病态地感受父亲的死亡。“嘿嘿”证明的不仅是自我解嘲，还有自我修养的缺失。加尔科夫斯基紧随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俄罗斯人的这样一些民族性格特征，如对自己优点的贬低、谦卑和对自己成就的低调态度。

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如《同貌人》和《地下室手记》）的特点时，加尔科夫斯基描写了奥季诺科夫想与纳博科夫谋面的愿望：“我随便在哪里这样，远远地，看一眼老人家（即纳博科夫）就什么也不想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所想象的东西看上去如此清晰、如此现实和如此的可信。整个思路清楚明晰。”奥季诺科夫形象同时兼有“小人物”和“地下人”的特点。他被赋予的反射能力显示出他性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固有的典型特征。奥季诺科夫一次在独白中承认，他的生活充满了悲剧，对此他的解释是：“可能，我过于沉溺于自身，过于耽于自我审视，过于看重自我的感受。要知道，悲剧实际上并不是不幸本身，而是对这一不幸的意识。”（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153）这类片断构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互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很多主人公都清晰地意识到了他们所发生的悲剧，从而使悲剧事件本身变得更加凄凉。除此之外，奥季诺科夫有意识地要表现得像一个圣愚：他想象大家称他为“傻子”，被众人所鄙视。这种行为模式同样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主人公。另一方面，对奥季诺科夫来说，社会如同“基本情绪组成的透明彩泥，只要最简单的操作就可以改变它们。”奥季诺夫狂妄自大的根源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拉思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等的形象中均可看到）。奥季诺科夫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清楚：“我善于处在支配地位，我过去总是支配各种情境，但我不善于处于领导地位。”（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392）奥季诺科夫对领导地位有潜在的能力，然而，作为一个意识高度发达的个体，他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主人公（如拉思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的思想属于乌托邦。根据加尔科夫斯基的观点，“奥季诺科夫变成了一个毫无目标的程式体，一个愚蠢的只会击败自己的天才。”（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648）加尔科夫斯基建构这一程式体的目的在于，奥季诺科夫吸收并折射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经验，在具体时代的情境中分析和显示其现实性和符号意义。奥季诺科夫形象的程式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相比是多层次的。加尔科夫斯基的任务在于，将文学代码的各个层次系统化，以便描绘出交织在一起并相互补充的互文性引文构成的完整图景。

奥季诺科夫对父亲的回忆着墨不多，描写的人物在很多方面复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事件的情境和氛围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描写相似。例如，在注释6中，奥季诺科夫回忆他的父亲醉酒后在融化的溜冰场滑雪橇的情景：“沿着篱笆站在围观的人群中。不知为什么，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双腿像是被电车截断，他像是一个傻瓜在残疾人车上蹒跚学步。……我扑过去救他——爸爸！爸爸！溜冰场上水没过脚踝处，我一下子就湿透了……”（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4-5）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故事《荒唐人的梦》描写一个八岁左右女孩的片断中，我们看到了如出一辙的童年的绝望（奥季诺科夫在所描写的片断中是九岁）：“我正在仰望夜空，突然有个小女孩一把抓住我的衣袖。街道上已是空落落的，几乎不见人影。远处有个车夫在轻便马车里打着盹。小女孩约莫八岁，裹着头巾，穿件短外衣，浑身湿淋淋的。但我特别记得的是她那双湿漉漉的破皮鞋，而且至今仍记得。她那双鞋子格外引我注目。她猛然扯住我的衣袖开始叫喊。她没有哭，但似乎在断断续续地喊着什么，由于冷得全身打战，未能把话说清楚。她被什么事儿吓坏了，绝望地叫着：“妈妈！妈妈！”（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3：т. 25，106）在这个片断中，我们看到了其中与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存在的更多的互文性联系。九岁的伊柳沙看到父亲被米佳当众拽胡子，他无法忍受，他那幼小的心灵因遭受的耻辱充满了绝望：“爸，爸……亲爱的爸爸，他羞辱了你！”（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2: т. 24, 190) 寥寥数语表露出加尔科夫斯基无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了儿童心理学家。

在注释 224 中, 我们可以看到拉思科尔尼科夫独特理论的折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 拉思科尔尼科夫建构起掌权者可以任意草菅人命的理论。在小说的末尾, 主人公发出了基督教式的忏悔。奥季诺科夫则在“颤抖的生物”意识和拿破仑之间保持平衡: “瞧我, 第一百万号的硕鼠, 以前和现在都把自己想象成国王,” 天才和小丑的地位对他来说同样的珍贵: “悖论: 我总是给自己很高的评价, 但又谦卑地评价自我。我想, 我的生活对我而言有着最高的价值, 但在周围人看来毫无任何意义。”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145)

事实上, 奥季诺科夫的童年回忆同样彰显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主题。同班同学以各种手段凌辱他。在分析自己的社会地位时, 主人公的结论是: “父亲的去世, 死亡的恐惧, 滑稽和荒谬永远地黏附在了确切的说只是一副‘衣架’的形体上: 让我在一群学生中晃来晃去。这时出现了与父亲之间的同化, 我仿佛领悟到他临死前的体验。我终于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我永远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傻瓜, 一切都会从我手中失落, 我将终身作为一个悬挂的衣架晃来晃去, 就像我父亲曾经晃过的一样。”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150) 孩子会以各种方式吸取父母的经验, 奥季诺科夫如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九岁男孩伊柳沙一样受尽欺凌。伊柳沙带着所经历的欺辱痛苦死去, 而奥季诺科夫在经历这些之后依然活着, 并且每天提醒自己父亲的儿子。主人公所受的侮辱与日俱增, 因为他无法挣脱与父亲的血缘关系。与此同时, 奥季诺科夫还经历了对父亲说不明白的“爱与恨”、“爱与死亡”。(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425) 大约在 13 岁时, 他因为父亲的一次不公正而报复了他: “是的, 你的生活总的来说过去了(把手放在肚子上, 带着装出来的同情心。接下来就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一辈子装傻, 而现在, 嘿嘿, 请到另一个世界, 那里既不会赊账给你, 也没有啤酒。请进到我们苏维埃的骨灰龛去。”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250)

作为一个被欺辱的人, 奥季诺科夫在童年时尝试在自身中培养出化解所受欺侮的能力。有这样一个片断, 主人公 14 岁时, 一次在医院强迫其他男孩在病房里用德语大声背诵诗歌。这里奥季诺科夫复制了他自幼就格格不入但他的同龄人却完全接受了的行为模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 14 岁男孩科里亚·科拉索特金同样拥有获得大家承认的渴望, 他躺到铁轨中间来表明自己不是胆小鬼。科拉索特金同样善于欺侮人(他强迫伊柳沙经受良心的谴责)。随着奥季诺科夫的长大, 主人公的举止行为变得千奇百怪, 这一切并非偶然。这可以解释为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 这也是为什么说加尔科夫斯基参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模式。他笔下的孩子千差万别, 性情迥异, 世界观也不尽相同。加尔科夫斯基尝试弄清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主人公对奥季诺科夫的影响程度, 以便分析各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成年之后, 奥季诺科夫开始试戴适合于他的“地下人”面具: “我就在那里侧着身子, 侧着身子从门缝中溜过去。不知不觉的。嘻嘻。我发誓, 再也不会有人认出我。我就像一只老鼠, 静悄悄的。就在那里。”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483) 在奥季诺科夫自我行为评价中, 出现了明显的讽刺。不仅如此, 奥季诺科夫的世界观同样是在“地下人”哲学影响之下形成的。“地下人”总是这样谈论自己: “我常常认为自己比周围所有人都聪明, 有时, 不知您是否相信, 甚至为此有所顾忌。至少我一辈子都好像在往边上看, 从来不敢正视人。”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3: т. 5, 103) 奥季诺科夫吸取了这个经验, 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天赋, 并用以下方式确定其存在: “我的天才是什么? 就是承认自己是天才。把承认天才作为最高级别的谦卑, 因为这对我来说, 这就是自己一钱不值的最高程度的坦诚相告。” (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37)

加尔科夫斯基的主人公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系列主人公既相似又有区别。“地下人”经历的爱与恨(他与丽莎的关系)酷似奥季诺科夫。两个主人公都极端自我, 并且均对此直言不讳。当丽莎离开“地下人”的居所时, 他追出去想喊住她, 但然后他又怀疑道: “‘我要干嘛呢?’ 我不由得想道。难道因为我今天亲吻了她的脚, 明天也许我就不会恨她了? 难

道我能够给她幸福吗？难道我今天不是第一百次地再次认清了自己的价值吗？难道我不会把她折磨至死吗？”（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73: т. 5, 177）奥季诺科夫不敢承认自己不善于爱，他试图清醒地评价自己的行为，认为：“我在生活中谁也没有爱过。没有具体的、活着的人得到过我的爱。尊敬、同情、体验过好感和情意——这些有过很多次。但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掏心掏肺过。”（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410）

无疑，“地下人”的情境与奥季诺科夫非常相似。然而，加尔科夫斯基让自己的主人公失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所拥有的激情。奥季诺科夫对自己的评价是无限的诚实、率直。加尔科夫斯基努力在奥季诺科夫身上清晰地展示“地下人”的品质，揭示出他们渊源上的相似性。

除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直接感知，加尔科夫斯基让奥季诺科夫有权成为一个俄罗斯经典作家遗产的独立读者。奥季诺科夫最感兴趣的是拉思科尔尼科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形象，他从哲学家的观点去分析他们的性格。

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拉思科尔尼科夫的理论遭到失败。奥季诺科夫没有试图使它复活。他通过讽刺甚至直接的否定来表达自己的不赞同。（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656）在注释 567 中，奥季诺科夫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是，他“是生物，但不是造物主”。他仿佛在自身中测试拉思科尔尼科夫的理论（“我尽量靠近创造的行为而丢失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丢失了生活的意义”），（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406）以此来揭示拉思科尔尼科夫的心理与他的生活环境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在注释 72 中，我们可以读到相反的意见：“我知道，我是一个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祇。”（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55）这一人物自相矛盾的思维和行为不是偶然的，这可以从其自身的属性上得到解释：奥季诺科夫是一个悖论构成体，他既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时又是读者和作者。后现代主义的讽刺对他来说同样不陌生，关于这一点，注释 929 中有明确表示，他认为，拉思科尔尼科夫有“比他人经常引用的‘生物’一词更有意思的句子：‘啊，我是一只具有美学思维的虱子，仅此而已’。”（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656）很多时候，奥季诺科夫是通过抓住某根逻辑线索，展开整团的新思维，按新的方式来诠释情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主人公都努力要得到上帝的眷顾。对奥季诺科夫来说，这个问题解决得很特别：“对我而言，同上帝的联系是单方面的。上帝不知道我，而我知道他。我爱他，在孤独的时候对着他哭泣。……但没有想过要上帝在旁边，要上帝帮忙。假如上帝帮我了，就意味着这不是上帝。”（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358）至于为什么会上帝产生这种态度，奥季诺科夫本人是这样定义的：“上帝对我来说从不是个隐秘的存在。”（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609）与伊万·卡拉马佐夫不同，魔鬼从来不光顾奥季诺科夫，虽然加尔科夫斯基的主人公不排除这一见面的可能性。在提出一千年之后谁将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这个问题时，他不无讽刺地回答说：“某一个长着三羊蹄子‘淋巴结溃烂、鼻涕拉瞎的倒霉鬼会蹦到档案架前，找到‘奥’开头的文件，拽出有关我的档案。”（Галковский 1998: 67）他针对未来文学研究的这番话充分表现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魔鬼特征。奥季诺科夫与伊万·卡拉马佐夫的互文性联系在这一情节转折处即告终结。

А.Ю.梅列仁斯卡娅是这样评价奥季诺科夫的：“《无尽头的死胡同》的主人公始终处于对自我的求索过程中，这个自我（根据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被视为是溶化在其他的文本中，由其他的引文内容组成。”（Мережинская 2003: 108）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奥季诺科夫形象的空心性。通过对这个人物马赛克式的描写，加尔科夫斯基实现了再现其本人的世界图景的尝试，这一世界图景常常需要借助他人的补充。А. П.卡扎尔金把奥季诺科夫同与他相似的人物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正如《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主人公维涅奇卡——一个俄罗斯圣愚畸形儿，奥季诺科夫自我表现为一个‘多余的人’，他的哲学思维完全是非必要

的和具有自得其乐的特点。”(Казаркин 2002: 58—59) 奥季诺科夫的真诚就这样被扭曲了。应该说, 加尔科夫斯基的人物根本不是在自我表现, 而是在努力运用哲理分析法按照社会需求解析世界图景的合规性。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悲剧的地位之后, 主人公发现在苏维埃社会中个性仅仅是悬疣附赘而已。

5 结束语

加尔科夫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拟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的: 1) 文体风格方面; 2) 将互文性作为主人公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段; 3) 主人公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读者。加尔科夫斯基《无尽头的死胡同》的特殊意义在于: 这部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其中包含纷乱复杂、甚至相互抵触的观点, 这一方面印证了社会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困惑和迷惘, 另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历史进程和人民命运积极、深入的思考。就艺术形式来说, 作品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 井然有序的叙事结构出现了引证性、片断性、无连贯性和不确定性, 其结构与后现代主义作品, 如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甚为相似。在加尔科夫斯基的这部作品中, 我们看到文化哲学和艺术感知的独特融合。这或许体现为大众文学作品的另一种特点以及作者别样的思维。总而言之, 加尔科夫斯基是当今俄罗斯文坛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怪才!

附注

1 <http://os.colta.ru/society/russia/details/15155/>

参考文献

- [1] Аллен Л.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Бог [М]. СПб.: Юность, 1993.
- [2] Волгин И.Л. Последний год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М]. Москва: Известия, 1990.
- [3] Галковский Д.Е. Бесконечный тупик. Москва: Самиздат, 1998.
- [4] Галковский Д. Е. Бесконечный тупик: исходный текст [J]. Континент. 1994. №81.
- [5]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 Л.: Наука, 1972-1990.
- [6] Казаркин А. П. «Маргинальный человек» — что дальше? [А].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pro et contra [С] Под ред. Н. П. Дворцовой. — Тюмень: Изд-во «Вектор Бук», 2002.
- [7] Мережинская А.Ю. «Знаки классики» в прозе Д. Галковского. К проблем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специф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 [А].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б. науч. тр. [С] Вып. IV.— К.: ИПЦ «Киев. ун-т», 2003.
- [8] Неизданны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83. [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1.
- [9] Скоропанова И.С. Русска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М].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1999.

The Infinite Deadlock – On Dmitry Galkovsky’s Postmodernist Novel

Dai Zhuo-meng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Russian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has led to variou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Dostoevsky. Galkovsky's *The Infinite Deadlock* is a representative one of them. We can find in this book not only the discovery in the philosophy of Dostoevsky's, but also the artistic sensation of the great writer and inheritance of his literary traditions. Meanwhile, Galkovsky has also made his ow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texts created by Dostoevsky.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quotation; intertextuality; sensation; Dostoevsky's tradi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社科项目“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陀思妥耶夫斯传统”(项目编号: 15WWB01) 的阶段性成果, 并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戴卓萌(1963—),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 2017-03-02

[责任编辑: 刘 锟]